

# 试论引入“传媒”的日常生活分析方法

——以中国的民间活动与传媒的关系为例

田村 和彦

TAMURA Kazuhiko

翻译：宗 晓莲

## 1 日本民俗学研究传媒的困难之一：对记录传媒的偏重

要论说以传媒为主题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原因可以归纳为民俗学作为重视“传承”的学问的同时，其研究视野也有着限于传统传媒的倾向。

本发表首先对日本民俗学有关传媒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概括，在其基础上，就将传媒引入各自研究的视野问题，尝试以中国的“广场舞”为案例进行阐述。由于传媒研究并非笔者的专长，相关先行研究的概括也超过了笔者的能力范围，因此本文的概述仅作为一次尝试。

作为媒体的传媒，一般来说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探讨。一种是作为记录媒体的传媒，书籍、影像资料等可以归纳为这一类。如果以日本民俗学会的杂志为线索考察日本民俗学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到“影像记录”、“记录影像”等不时地被讨论。以近年来说，比如2010年264号的小特集《民俗学与影像记录》、2012年第864回民俗学座谈会上远藤协先生播放、汇报的《影像民俗学的新展开》等，都属于此类。在重视口承方式的同时，对作为传媒的一部分的文件档案、日记、地方志等以文字和绘画为媒介的记录倾注了很大力量的民俗学来说，将影像资料作为记录民俗仪式的手段，加入到民俗学的传媒研究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一意义上，在民俗学的传媒研究中，以这一作为纪录媒体的传媒为中心积累了一些先行研究。

很有意思的是，民俗学的相邻学科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最初被引进的也是作为记录媒体的传媒。在日本，早在1974年杉田繁治就提出了“电脑民族学”，并成立了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第5研究部（通文化研究）的一个部门。据考证，其背景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设立时，第一任馆长梅棹忠夫曾经提出利用电子计算机将博物馆所收藏的所有资料进行记录、整理，使之成为可以进行检索的资料，以应用于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分析及数据库化的构想（奥野：2009）。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当时，将需要特殊技术的电脑扩展到以其为工具进行利用的人们的工作中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原本杉田提出的“电脑民俗学”并非是为了简单的检索资料而进行的资料叠加，而是为了“人们具有但被忽视的潜在知识、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所掌握的信息，如何才能引导出来呢，那就是利用电脑的相关技术实现它”。我们应该注意到杉田的这一高瞻远瞩的构想。此后，作为电脑民族学的对象，杉田列举了以下四点：

- (1) 民族学研究中的数据库的作成 （杉田：1994缩印版）
- (2) 信息的加工
- (3) 依据模型、模拟的研究
- (4) 作为物质文化的对象的电脑

本文所尝试论及的，是既作为操作对象，也促使操作者发生变化的“物”的技术，也就是广义上的上述第四项目的内容。这也是上文所说的有关传媒研究的第二方面的方向性。不过在具体分析这一方向性之前，还想述及一点近年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动态。2009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编纂的新《文化人类学事典》中，在论及传媒时，设立的项目是“手机和网络”（木村:2009）。具体列举了手机、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网页等内容。其背景是，以人类学的眼光，也就是田野工作中，论及知识的回路或日常世界的构成这样浸透到日常生活的传媒问题，必然面对的是手机及网络。也就是说，在这些传媒尚处于仅有一部分人能够使用、属于特殊技术阶段时，作为专家的记录媒体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技术革新急速发展，普通大众也开始使用，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也经常耳闻目睹之后，传媒开始作为分析对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做田野工作这样全方位观察、研究人们生活的研究工作时，往往出现超出事先仔细构想的研究计划的人们的实际情况进入研究视野，改变研究初衷的情况<sup>1</sup>。事实上，在文化人类学中，对通过网络、传媒而形成的社区的关心早在2000年后就已经出现（比如Wilson and Person:2003），再以本发表所关注的手机为例，只是在日本出版的日文书籍中，也有着诸如论及了近年来作为交流媒体的手机进入非洲各地人们的生活的《传媒的田野工作——非洲和手机的未来》（羽濑等、2012）、考察了手机这一工具进入日常生活后引发的变化的《手机的文化人类学》（金暲和:2016）等，在文化人类学中，传媒已经是重要的考察分析对象。这一倾向与日本民俗学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一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背景中，也有着在不同的田野工作地点，对收音机、录音机等技术与人们的关系的关心这一人类学的研究积累有关（関本:1986、宫武:1995、2000）。

问题是民俗学为何没有对传媒进行积极的考察研究。这应该与日本民俗学讨论交际传媒（communication media）的困难性有直接关系。在笔者看来，还可以将民俗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作为假定理由之一。也就是说，日本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讲堂，也就是说作为一门独立学问再设置时，引以为对照的学问领域是历史学（林：2011）。与当时的历史学（除了考古学以外）是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学问相对，强调研究对象是不依赖文字的传承，其结果是，在研究对象水平上形成差异的同时，带来了过于重视过去、重视记录的倾向，在积累了从世界来看也是非常丰厚的记录的同时，对作为构成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的传媒的关心并没有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点。这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研究交际传媒的第一方面的困难。

## 2 日本民俗学研究传媒的困难之二： “超越世代的传承”、“民具”等概念问题

民俗学研究中，论及传媒时的第二个方向是上文杉田的分类中第四项中提及的将传媒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说广义的传媒包含了所有可以囊括的内容，这一研究方向将Tradition理解为传承，与占据研究中心的旧来民俗学研究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探讨揭示基于新技术的传媒的研究并不多。虽然日本民俗学会志《日本民俗学》有过作为记录的民俗映像特集，以传媒为研究对象的特集还没出现，总体上是比较低调的。柳田早在《明治大正史相篇》的序文中，就指出过以新闻记事为研究对象的尝试和以此为对象揭示现实社会事相的困难性<sup>2</sup>，然而可以说民俗学一直没有将大众媒体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论及其理由，应该不是传媒所报道的现象与日常生活的距离问题，而是民俗学将自己定义为“以全国各地超越世代传承下来的习俗、惯例、传说等民俗事象为资料进行研究的学问”（福田：1983，下划线是笔者所加）。从这一“超越世代”的认识来看，不管是大众性的（mass），还是个人性的（personal），传媒所传达的内容是一次性的现象，或者被理解为“流行”，被列为民俗学的研

究范围之外。其结果是，媒体所叙说的理解现象的框架，构架了我们所了解的“生活世界”、定位了社会现象，而媒体的叙说又受到“生活世界”的极大影响，而这样复杂的相互关系在民俗学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在民俗学中，首先关注传媒这样的新科学技术的是研究口承文艺、闲话杂谈的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早期的包括70年代对“咧嘴女”、80年代对“人面犬”等的研究，与一直以来的口承故事一起，分析通过大众媒体扩散的都市传说(Urban Legend)的传播等，近年来还出现了对网络上创造、共有的对象作为电承(Net-Lore)进行分析的方向(伊藤:2008、2016)<sup>3</sup>。然而，虽然这些研究也注意到这一复数对复数的、处于大众媒体与个人媒体的中间带的机能，到目前为止，这类研究还仅限于网络空间中以都市传说为中心的各种故事。其结果是，本文所关注的，人们如何在自己的社会语境下使用作为“物”的媒体，如何对该媒体的使用方法进行扩大、活用、乃至创造，与其同时，原本的生活世界也由于对媒体的使用而发生变化，这样的关系性并没引起充分的关注和分析。

不管怎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因特网诞生(1989年3月12日)超过1万天的今天，森栗曾经指出的“直接面对信息社会的是口承文艺研究”(森栗:2001)的倾向依然持续着<sup>4</sup>。

这一作为研究对象的传媒的下位分类中，还可以列举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等。

有关以不显见的各种价值观对各种内容进行排列，形成故事、并传达的报纸上的新闻(大众传媒)，岩本教授的发表有详细论及，笔者这里以作为个人媒体的代表，手机为例探讨中日的一些事例。手机和大众媒体，都有着超越空间的特征，两者最大的差别是手机是双方向的媒体。与大众传媒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传播信息相比，电话从其登场时起就具有了双方同时交流的双向性，而今天得到很大普及的智能手机，不仅可以进行直接的音声通话，正如2011年诞生的短信软件微信(WeChat，在日本被广为使用的则是LINE<sup>5</sup>)，已经包括了可以使用文字、照片、动画、群聊等功能。SNS的形式还具备了社区功能。

毋庸赘言，手机属于电话类，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说明电话这一传媒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之事。在传媒研究领域，报纸、电视作为大众媒体的中心，很早就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电话，正如吉见等人所引用80年代G.Fieldding和P.Hartley指出的那样，“处于有关大众交流的社会学研究和有关对面交流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间部，作为研究对象被制度性地遗忘”，“被忽视的传媒”(吉见等:1992)。然而80年代后，日本的社会学界重新确认了电话研究的重要性。虽然与其他的传媒研究相比，是起步比较晚了，同时作为传媒的电话研究是以社会学为先驱的，因此相关研究也以从社会侧面出发描述新技术与社会相遇、相互影响变化的过程研究为主。然而这些研究动向并没有对日本民俗学产生影响。其理由正如上文所述，民俗学一直没能将作为代表新科学技术的电话、手机作为研究对象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民俗学以微观的、本质的调查为基本也是原因之一。电话所具有的超越空间的特征，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分散化，这使得在田野工作中很难把握整体像。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正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显示的，通过在“对象化”方面下功夫就可以缓解。既然民俗学提出探求生活的方法，标榜是“现在学”的学问，本文认为有必要将这一媒体列入研究对象。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线索的，是学会杂志上几乎是唯一的探讨了手机的论文，这就是林英一的《作为生活道具的手机》(林:2001)。林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民俗学以“物”为对象的研究中，有“民具研究”，是“研究在过去的生活场景中使用过的道具，过去的=传统的，可以找出其存在的意义”为问题点，因此林的文章中，通过使用“生活道具”而不是“民具”一词，将手机这一“通过‘物’看到的人们的模样”作为问题点(林:2001:86)。从教育现场发现新普及的传媒这一意义来说，与J.Dorst提起的问题有着相同动机作为背景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然而，在2001年发表的这一文章之后，虽然手机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没有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关注点。

这一可能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理由之一，在于上文所述的过于聚焦于记述媒体。在这里，笔者尝试着假设另一理由，并将其看作日本民俗学考察传媒的第二点困难。

这里所说的困难，来自于学术组织的细分化。对以手机为代表的交际传媒从民俗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从收授信息的意义上来说，可以从口承文艺的侧面进行研究；如果从手机、智能手机之类的“物”的角度着眼，可以从物质文化的侧面进行分析。然而，过去日本民俗学涵盖的对这些内容的关心，随着学科的细分化，口承文艺归属于“日本口承文艺学会”（Society for Folk-Narrative Research of Japan:1977年成立），有关“物”的研究（虽然“民具”研究是否也可以将作为“生活道具”的手机也包括在内，正如上文中林所指出的，现在还不明确），归属于“日本民具学会”（The society for MINGU of Japna:1975年成立）。当然这些学会的会员也存在多重所属的情况，然而这样的细分所带来的缓和的“分担”，一定程度上妨害了以交际传媒为主题的研究。

### 3 日本民俗学研究传媒的重要性

正如上文所述，对日本民俗学来说，要考察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交际传媒，决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必要将它们列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内。在这里简单地列举两个理由来说明。第一，民俗学关心诸如“生活世界就是这样”之类的很多人所持有的世界观，以及人们为了生存而必须学习并具备的规范、正统性以及善恶等价值观，这些世界观、价值观等是如何传达（或没被传达）、内化（或者没被内化），对民俗学来说，是关系到民俗学的根基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这类急速发展的交际传媒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关节点。

第二，新技术或新“物”在人们的想象力中被把握利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民俗学对这一变化、受容的过程有着很强的关心。即使不是完全的新东西，也会具有了新意涵、新作用，在意涵、作用水平上发生变化应该是民俗学的一个前提。如果是这样，作为交际传媒的手机的普及发展，对民俗学来说应该是很有讨论价值的对象。

此时应该注意过去人类学民族志记述中曾经出现过的倾向，那就是作为“民族志的现在”，具备了完全的有机的关系性的对象社会，随着有着新技术背景的“物”的登场而发生变化，由此就丧失了意涵世界的体系性，如此这般的充满丧失感的记述。这类记述的特征是，对过去的完全性进行细致的描述，后半部则对简单地就可以触及的变化进行解说。将现代技术定位到民族志研究中、推进了人类学的技术研究的宫武在这方面曾有过出色的分析。他引用了清水的很有启发意义的公式（宫武：1995、2000）。根据清水的分析，初期人类学和西欧近代社会的思考中存在着先验性的方程式，将其归纳为“原有的社会和文化、其衰退”+“外部影响”=“调查地的社会和文化，其现状”，过去的人类学者通过从现状中剔除“外部影响”，构想了“传统社会”（清水：1992）。对民俗学来说，其诞生和发展的契机之一，就根基于某种浪漫主义，因此应该更明确地认识这一指摘。

讨论手机这一传媒的方法，应该存在着从手机的普及对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正攻法，和从在哪里都可以见到的普通的日常事例出发，探讨人们如何与这一传媒产生关联的研究方法。传媒研究并非笔者的专门，要归纳总结前者的正攻法存在一定困难，因此，笔者在这里降低难度，从对于从事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后者的方法出发，列举事例进行探讨。

本发表将探讨手机的再配置，也就是说，作为新技术的手机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在人们的使用、期待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顺着某一方向发展。改变与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对抗的态度，不是将手机作为对象，而是通过手机理解我们在田野中见到的现象，由此可以开拓研究方向。这样做有着将已经成为极常见的手机现象加入研究者们各自的田野调查，或者说加进研究者们视野内，民俗学

也由此可能加入到传媒讨论中。

## 4 通过近年的传媒思考中国的“广场舞”事例 ——试论受到科学技术支撑的当今日常生活

基于上文所述的各种背景，本发表将聚焦于一眼看来与传媒毫无关系的广场舞和媒体，特别是手机<sup>6</sup>。选择这一在中国各地都可以广泛目睹、极为“日常”的，与过去没有表面连续性的对象，可以确认即使是可能被认为是简单地动动身体就可以做的广场舞现象也是以各种水平上的传媒这一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同时应该也可以窥见，支撑手机的技术并不是在技术自身所预测的范围内影响改变着社会，而是在人们自己的各种窍门、应用中被赋予语境、找到意义。在这一意义上，上文所引用的清水所说的，与其说如果排除“外部影响”就不能理解的对象，不如说更应该聚焦于与该物的交流方式。

本文所探讨的广场舞，狭义的看法认为起源于2008年佳木斯市体育局在秧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体育、舞蹈以及健美操等多种运动要素，作为有益于健康的有氧运动而体系化的一套舞蹈体操。一般的看法是在融合了原有的人们在公园等场所跳的各种舞蹈的基础上，在中国大陆得到爆发性的普及的舞蹈(维基百科：广场舞)<sup>7</sup>。在推进国民健康意义上来说，广场舞是之前的集体运动广播体操、以及如今在公园、街角到处可以看到的“健身器材”所依据的1995年开始的《全面健身计划》国策的延长线上的一部分，然而广场舞也因其爆发性的普及和人们的广泛的自觉参与而被广为所知<sup>8</sup>。虽然有着促进健康的正面力量，同时也引发了诸如没有正式向政府登记、难以控制的团体激增以及噪音问题等新社会问题。其结果是一方面在2015年的CCTV的春节晚会上演播了“最炫小苹果”的广场舞集体舞(组合了2009年的流行歌曲《最炫民族风》和2014年的流行歌曲《小苹果》的乐曲，由北京群众艺术馆的人员身穿强调了广场舞特点的运动服进行了伴舞)，另一方面，2015年9月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发布了《关于引导广场舞健康展开的通知》，由各地方政府对舞蹈的时间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不断走向管理化和规范化。

这一在当今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日常化了的广场舞，以自愿、对外开放性、按照一定的节奏活动身体为特点，很多关心都聚集在人们的身体动作，可能很难马上联想到与传媒的关系(照片1)。然而，这样的集体的做统一动作的行为，其实与传媒有着很深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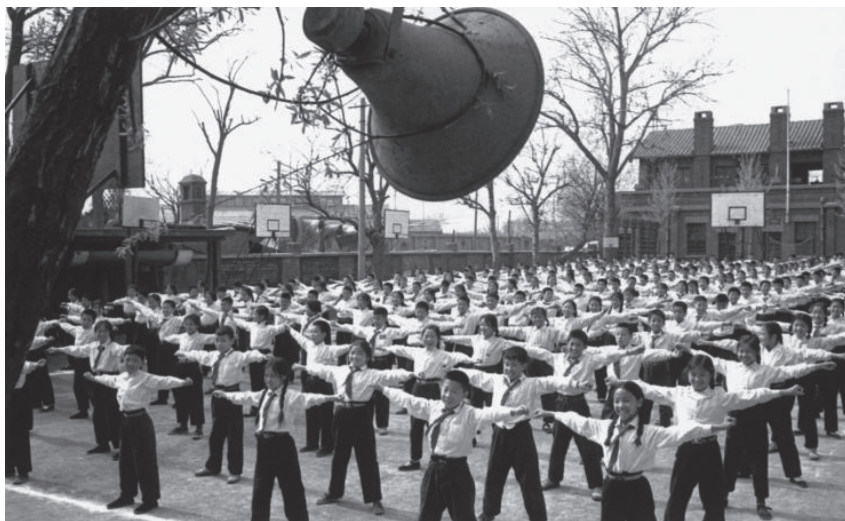
说起与广场舞同样的、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集体运动，在中国首当其冲的可以列举广播体操。中国的广播体操于1951年11月公布，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体质的集体体操。最早时，曾被称为“辣椒操”，这是中国广播体操的原型的日本广播体操(1928年~)的音译。配合广播体操的公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共同发布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次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的文章，12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放送。从这时起，中国全国一起做体操的样式得以确立。

当时，虽然做体操的主要是中小学学



照片1 在空地上跳“广场舞”的人们  
(2015, 北京, 笔者摄)

生以及工厂的劳动者，然而伴随音乐做体操的样式曾流行一时（照片2）。这一体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不断更新换代，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过中断，但不久就又得以恢复（这一第五套广播体操（1971年）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播音开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一时期，由于动作优美、规范而上了新闻的孩子之一，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武术明星的李连杰）。



照片2 依靠传媒统一了的“广播体操”  
(资料来源：中华遗产网 <http://www.dili360.com/ch/article/p5350c3da2503183.htm>)

如此这般的全国上下一齐做集体体操现象的出现必然离不开支撑它的技术“广播”这一传媒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为舞动身体而伴奏的音乐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这些活动的个人化发展，而可以携带的磁带式录音机的登场又与迪斯科、健美操的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延长线上，现在在各地的公园、道路两侧，各种自发的、未登录的团体不断出现，以广场舞的形式，每天清晨和傍晚不断重复推广着各种集体舞蹈。有关这一活动，学者们从体育与健康、广场舞与过去的集体舞的关系、以及噪音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然而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其中产生的人际关系与传媒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下面笔者将从多个侧面来分析支撑广场舞的传媒。

首先，广场舞需要有其伴奏的音乐。这些音乐大多是从90年代到今天的各种流行歌中选出的。而这些音乐的放送，则是以上文也提及的个人化的音响设备和保存媒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支撑广场舞的主要技术，现在是保存从电脑下载的MP3音乐文件的可移动媒介（很早就开始活动的团体则经历了从磁带式录音带到CD的变迁），和可以移动的立体声喇叭装置（很早就开始活动的团体则经历了从磁带式录音机到CD播放器等的变迁）。现在，移动式立体声播放器成为广场舞的标准装备在网络店铺（京东网）和街头的电器商店出售（照片3），这可能是在中国之外的地方看不到的现象。也就是说，这可以看作针对普遍的技术（立体声装备），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修整、改装，以重新适应语境的一个事例。

接着是广场舞的一个大问题，虽然不象广播体操那样，全国在同一时间、做划一的动作，然而可以说广场舞的动作非常相似。各广场舞团体就选择的特定乐曲跳动作划一的舞蹈，可以通过实际



北京有货，下单后2-6天发货

¥299.00 赠品

先科 (SAST) ST-809WM广场舞拉杆音箱 蓝牙户外便携式音响 大功率低音炮带  
已有4100+人评价

对比  关注



¥289.00

双诺 声美Q801 8寸户外拉杆音箱 带无线  
麦克风广场舞音响 便携式大功率扩音器  
已有1.6万+人评价

对比  关注



¥489.00

先科 (SAST) 天韵11号 12寸拉杆音箱广  
场舞音响户外 便携式插卡扩音器带无线麦  
已有6100+人评价

对比  关注



照片3  
网络商店和家电商场售卖的广场舞用的移动  
式立体音响装备  
(上 京东网：2016年8月28日)  
(下 家电商场所推荐的广场舞用的音响装备)

观察在某一场所的具体成员的学习过程来理解。团体前方是领舞者(被称为领舞、领头、老师、大妈等，是团体的中心人物)，中间是经常参加者模仿领舞者，周边则是刚参加的新手或临时参加者也模仿领舞者或熟练者，可以说是某种LPP状况。

然而，为什么全国的广场舞在编舞和选曲上非常类似？对于这一问题，只是注目广场舞的现场并进行观察可能找不到答案。另外，对于新的曲目，广场舞的成员们能跟上、学会跳吗，只是探求特定地域的各种传承关系可能也找不到答案。

如果先说结论，那就是具体的选曲、编舞的决定和普及过程中，传媒，特别是智能手机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也是传播和受容，以及身体化的问题。

首先来看看舞蹈的创作。有关舞蹈的编舞，既存在各团体独立创作的情况，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广场舞的舞者经常参照上载了很多广场舞画面的各种网络。如土豆网（2005年正式公开，以“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为口号）、优酷网（2006年公开，以“三网合一”，也就是覆盖因特网、电视和手机三个末端为目标。2013年与土豆网合并）等动画网站上，既有专家级老师上传的“课堂”教学，也有普通人上传的各有特色的舞蹈。因为是动画网站，功能上与Youtube接近，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乐曲、舞蹈动作，编入本团体的广场舞中<sup>9</sup>。在这一意义上，有关舞蹈的动作，是对网络公开的其他舞蹈团体的模仿，可以说是以媒体为媒介的传播（照片4）。另外，由于这种模仿是一种扩散性的复制，民俗学经常探讨的原型与变异之间的关系性不再那么清晰之点也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从她们如何组合新的舞蹈动作这一接纳方来分析，这里又有着创作的特点。无

数的团体上传了自身的舞蹈，要从中挑选“适合自己的团体”、“想跳跳看”、“动作美”、“与乐曲的氛围合适”等，与她们对自己团体的认识（实际上，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舞蹈，参加者们可能不来跳了，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成了成员流动到其他广场舞团体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对舞蹈的选择，是基于各团体的审美观（价值观）。实际上，某“大妈”比较了过去的集体舞和自己团体的舞蹈动作后，“‘忠字舞’的动作是直线性的，与现在的时代不合适”，“民族舞的眼神与手指动作很和谐，很美，所以加入了”等详细向笔者说明，当笔者对一些具体动作表现出不太理解时，她从包里掏出智能手机，



照片4 向笔者展示自己的团队所模仿的舞蹈团体的动画的广场舞舞者  
(笔者摄)

马上给我看了动画。培养这样的价值观的是，不管在时间、空间上有着多远的距离也可以简单地提供几乎与现场表演同样的动画、声音的网络媒体的存在。虽然教授广场舞的DVD也有售卖，然而在笔者的调查范围内，不包括那些跳专门性很高的恰恰舞、探戈，或国内的各种民族舞，参加舞蹈教室的热情的舞蹈爱好者，对于那些早晚跳狭义的广场舞的人们来说，可以通过手机看的网络动画对他们有着更大的影响。

接着，想探讨一下在同一团体内如何统一舞蹈动作这一问题。能够以统一的动作跳舞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是在同一场所反复练习。很多广场舞团体都在每天早晨和晚上跳两个小时的舞蹈。这样的反复行为，可以让身体熟记特定的动作。然而，并非所有的新编的舞蹈，都是长时间一起练习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新的编舞在成员间共有的过程。很多广场舞团体都是由管理关系不太强的会员构成，会员们每月上缴很少的会费以填充立体声播音器的电费等。会员登录大多是通过智能手机的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笔者的调查对象很多利用的是“微信站”，利用这一会员登录制的社区机能，从下雨天广场舞的停止、遗忘品有无等联络事项，到最近的热门话题等都可以也发信。也就是说，使用SNS的功能，登录某广场舞团体的会员，就成为“舞友”、形成选择性的“连接”。这一点是在现场观察到的，谁都可以参加、开放性的广场舞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说，有着对SNS外部闭锁的集团性。这一给新的团体提供宛如大家都可以面对面状况的SNS功能，对近20年来流动性迅速增强的当代中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广场舞来说，她们利用这一崭新的封闭的回路，向本团体的会员配送新乐曲及舞蹈，这样成员们就可以进行事先的练习，广场舞时间外的练习也有了可能。其结果是即使是新舞蹈，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动作一致性。在这一意义上，SNS功能的这种活用，又成为促成在广场等地方观察到的团体景观的背景装置。



照片5 为了上传动画而拍摄录像的广场舞团体  
(2016, 南京, 笔者摄)

这样的提高了舞蹈熟练度的团体中，就会出现将自己的舞蹈上传到网络的团体（照片5）。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团体都是人数较少，有统一的着装，团体意识也比较高。这些人通常利用可以上传个人信息、进行自我表演的动画网站或微博。利用这一服务，上传本团体的动画的人们中，有些人将跳广场舞和在网上公开动画看作缓解家庭中婆媳、母子矛盾，消解看护长辈的疲劳，并找回自我的一个契机。如果上传的动画



吸引到众多浏览者，收到很多按“好”键，得到点赞，就可以得到很大的自我肯定。这一公开舞蹈画面的行为，可以看作理解人们如何在难以逃避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有意识的区分“日常”和“非日常”，以及有关追求生活美学思考的一个契机。这些上传到网上的动画，正如前文所述，又作为各地、各个广场舞团体进行选曲和编舞时的一个参考，被资源化，并被循环。

当然，具有这里所列举的表现广场舞舞蹈动作的动画的传媒，并不仅限于智能手机。用电脑看DVD，或通过电脑上网看动画都是可能的，这样的行为也可以看到。然而，对广场舞来说，智能手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广场舞是在户外，而且是临时占用一定空间跳的集体舞。可携带，近年来得到急速发展、超越一对一的通话关系的束缚，具备了相机、电子地图功能，可以叫出租车，甚至可以直接缴费买单等等，智能手机成为可以满足多种需要的万能武器。因此，正如其名称的“多媒体”的智能手机在广场舞者中得到广泛使用。

至此为止，笔者论述了即使是以非常基本的条件就可以做的中国广场舞，也得到了现代技术的支撑，成为可以观察的实践。笔者也试图通过这一事例说明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现代技术不可分开的现状。可以说，这种程度的对技术的依赖，不管在什么样的田野、不管是以什么为对象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对于这一就在眼前的状况，应该具有不因为民俗学没有将其列为研究对象，就将其排除出自己的考察研究的框架之外的视野。

## 5 小结

本发表简单地回顾了日本民俗学有关传媒的研究，指出其偏重于传媒中的一种，记录保存资料，而以现代传媒为对象的研究很少的现状，并提出了两个假定理由，①民俗学的学术化过程中，与历史学对照对自学科进行的规定。②如果以作为交际传媒的手机为例，则存在着将此列入口承文艺、民具为中心的学会分化问题。

在其基础上论及了民俗学有必要将交际传媒列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因为它们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中(普及)，日常化，同时由于人们以各种形式、在各自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交际传媒，因而它们形成、促进了今日的日常生活(形成新语境)，指出以现代学自居的民俗学，有必要考察交际传媒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以这一现代技术为支撑的“物”如何在生活中被再配置的问题。

作为一个事例，列举了在中国各地广场上进行的团体舞蹈，这一似乎与现代科学技术或媒体相当遥远的事例。在支撑这一现象的技术方面则以智能手机为中心详细分析了现代媒体在广场舞活动中的作用。在那里可以看到诸如价值的传达与共有，信息的传播、复制和身体化，热情与仰慕，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与选择性的社区的形成，以及在日常中对“非日常”的创造与生活的美学等等，对民俗学来说非常重要问题的要素。

如此这般，民俗学有必要研究广场舞，不是因为它是融合了秧歌舞等民间舞蹈的现代版，而是因为从民俗学视点探讨这一极为流行、在各地都可以看到的现象，可以更好地解说我们的现代生活。

如果民俗学以这种现代传媒为主题，从正面论述手机、网络引发的社会变化可能是最有效的。然而，同时，学者们在各自的田野工作、研究主题中论及传媒，从而形成积极考察传媒的局面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应有的视线是不将新传媒看作阻碍旧有状况的“外来因素”排除出去，而是要考察这一新东西如何与人们发生关系、产生联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观察现代社会，并更好地展开改善“公民的病和穷”(柳田：1931(1993))的议论吧。

## 注

- 1 笔者从2000开始在陕西中部农村做田野工作时，做过有关生活用具的调查。十五年来，一直持续了对该村的调查，其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之一，可以说就是物质生活的变化。  
就本文关心的手机而言，在笔者开始田野调查之初，村里的广告板上写着“装了电话，就可以知道今天苹果市场的价格”样的宣传广告。虽然固定电话也走进了人们的家庭，然而由于初装费很高，很多人家都是使用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装了固定电话的家庭，只有包括村书记（1991年安装）的17户人家（主要是有孩子在城里，或是为了做生意，联系方便）。在笔者居住的村民小组中，拥有手机的则只有村书记（1999年购入的摩托罗拉）、当时是包工头的男性（1999年购入的诺基亚）和我（1999年购入的西门子）三人，从制造商的角度来看，手机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手机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借用手机的现象也多次出现过，也就是说，手机并不完全是与个人连接的。同时，这样的使用方法与之前曾得到广泛使用的BP机的使用方法有着连续性。  
从笔者开始调查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5年，现在该村中停止固定电话、家人各自使用手机的家庭也并不少见。另外，作为日常生活工具的手机，特别是对老人来说，很多并不是自己购入的，子女们在自己更换手机时转让给父母的情况很多。  
另外，该村也在2011年开始模仿城市跳广场舞了。
- 2 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困难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现象存在着难以记事化的问题，（记什么？What），与在什么样的框架内记事（怎么记？How）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 3 在这里想特别介绍在不同背景下提出“电承”这一词语的民俗学者。福间（2004）论及了在人们的口口相传的故事和报纸记事的基础上，在媒体上放送祭祀、仪式被地理位置距离很远的人们接纳理解的过程，从电视、人们间的实际交流、身体化、正统性以及人们的羡慕等角度进行了论述，并称其为“电承”。这是一直倾向于从口承文艺角度研究传媒的民俗学的一个突破点。
- 4 不过，从口承文艺角度进行的研究一直是主流的同时，

也可以看到从传播与受容、复制、再生产的角度进行的有启发意义的传媒研究（如，法桥：2000）。

- 5 在中国，在日本为大众熟知、来自海外的，同时在本文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些网络服务，如Facebook和Twitter在2007年后被切断，Youtube在2009年后被切断，LINE也在2014年后被切断，无法使用。作为替代，存在着拥有这些功能的中国自己的服务系统。
- 6 有关广场舞的民俗学分析，已经有周的优秀论文（周：2014）。周文偏重于广场舞与过去的集体舞的连续性/非连续性问题，从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有关广场舞全面像问题请参照周文。
- 7 从舞蹈的形式来看的狭义的广场舞，正如本文中提及的，是政府主导的、近年才开始的动作简单的舞蹈，然而在空地或广场上活动的舞蹈团体，则涵盖了从接近广播体操的简单运动，到恰恰舞、伦巴舞及吉特巴舞（Jitterbug）等需要很高技巧的拉丁系交际舞，以及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舞蹈，融合了多种舞蹈形式的广场舞也有很多。本文中论及的广场舞是指在公园等地方自发形成的舞蹈团体，是广义的广场舞。
- 8 实际上，广场舞参加者的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在跳舞的间隙吐吐婆媳关系、职场关系的苦水，或是交流信息，打发闲暇时间，对舞蹈的热情等等，存在着多种因素。详细情况在另一篇论文中论述。这一由选择性的“缘分”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一起流汗的过程中成为“熟人”，在共同的体验中形成对等的友好关系，互相帮助的互助关系，有时在看护上一世代和有关个人健康的问题上也形成Self-Help Group或Group Counseling的关系。  
详细论述将在另外的文章中阐述，本文中只打算指出原本预想将带来个人化的手机，在既有的社会倾向性中发生变化，在以流动化、个人化为代表的再回归状况中展开新的“人”的生存方式这一点。
- 9 有关广场舞，在王崧兴和末成道男等人提出的概念和“差序格局”概念的基础上，探讨在这一场所扩展的人际关系的内容在另一篇文章中论及。因此，本文中仅探讨有关媒体的这部分内容。

## 引用文献

- 伊藤龍平 2008 「ネット怪談「くねくね」考—世間話の電承について—」、世間話研究会(編)『世間話研究』18号、1—13頁  
2016 『ネットローアウェア時代の「ハナシ」の伝承』、青弓社  
奥野卓司 2009 「情報人類学の射程—フィールドから情報社会を読み解く」、岩波書店  
木村大治 2009 「携帯とインターネット」、日本文化人類学会(編)『文化人類学事典』、丸善、504—507頁  
金暲和(Kim Kyoughwa) 2016 『ケータイの文化人類学』、クオン  
清水昭俊 1993 「永遠の未開文化と周辺民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17巻3号、417—488頁

- 周星 2014 「秧歌舞/忠字舞/广场舞——现代中国的大众舞蹈」、2014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原稿(2014年11月)
- 杉田繁治 1987 「コンピュータ民族学」『文化人類学辞典』、編集委員石川栄吉ほか、弘文堂、1987年
- 関本照夫 1986 「モニュメントとしての歴史」、関一敏(編)『人類学的歴史とは何か』、海鳴社
- 羽濑一代、内藤直樹、岩佐光広(編) 2012年 『メディアの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アフリカとケータイの未来』、北樹出版
- 林英一「生活道具としての携帯電話—今時の女子高生による活用法—」、日本民俗学会(編)『日本民俗学』225号、2001年2月、84—101頁
- 林淳 2011 「アカデミック民俗学の成立:宮田登を中心に」愛知学院大学文学会(編)『愛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40号、314—299頁
- 福田アジオ 1983 「民俗学研究法」、福田アジオ、宮田登(編)『日本民俗学概論』、吉川弘文堂、265—269頁
- 福岡裕爾「ウツスということ—北海道芦別健夏山笠の博多祇園山笠受容の過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14号、155—226頁
- 法橋量 2000 「フォークロアとマスメディア—ドイツのタブロイド紙を材料として」、世間話研究会(編)『世間話研究』第10号、132—146頁
- 宮武公夫 1995 「現代技術と社会変化:人類学的技術研究へ向けて」、大阪大学人間科学研究科(編)『年報人間科学』16号、163—179頁
- 2000 『テクノロジーの人類学』、岩波書店
- 森栗茂一 2001 「民俗学に求められる社会的説明責任と学問の脱構築—情報化社会では、学術特化は陳腐」、日本民俗学会(編)『日本民俗学』227号、2001年、267—277頁
- 柳田國男 1931(1993) 『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新装版)、講談社
- 吉見俊哉、若林幹夫、水越伸(編)『メディアとしての電話』弘文堂、1992年
- Dorst, Jhon 1990 “Tags and Burners, Cycles and Networks: Folklore on the Telectronic Ag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27, No.3, The Folklore Institute, Indiana University, pp.179-190
- Wilson, Samuel M. and Person, Leighton C. 2003, “The Anthropology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31, pp.449-467
- 維基百科:「広場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9C%BA%E8%88%9E>(最終確認2016. 8.19)